

从传统到现代：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

程霖 陈旭东 张申

摘要：近代以降，中国经济思想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特别是建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化经济学体系；动力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内在需求驱动和外来思想冲击叠加；条件是从封闭走向开放所引致的经济转型实践和思想激励参照。在引进、学习、选择、创新的变迁模式和路径下，中国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应用和交融之中不断发展，同时立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实现了经济思想从传统的前科学状态向现代的科学状态的转型，逐步践行并强化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变迁同样未达终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新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变迁的重要目标任务。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 传统 现代化 变迁路径 中国经济学

[作者简介] 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clin63@sufe.edu.cn；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chen.xudong@sufe.edu.cn；张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200020，电子信箱：zhangshen@sass.org.cn。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7ZDA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地位和价值研究”（批准号：17AJL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转型变迁研究”（批准号：22BJL13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批准号：2019BJL002）和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与思想研究”（批准号：2020110932）的资助。

引言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尤其在17世纪前的内生演进时期，其主要依托于先秦以来农业经济文明和商品货币关系较长期的持续繁荣和发展，在探索积累中取得了光辉成就。然而，17世纪后在西方经济学逐渐步入体系化、理论化、科学化发展轨道的同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却“趋于凝固”（胡寄窗，1981a），始终停留于前科学阶段。^①直至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从农耕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西方经济思想由浅入深、渐次传入，新旧经济思想冲击碰撞、此消彼长，启动了中国经济思想^②从传统向现代^③的变迁，其核心是前科学状态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因与时代脱节而启动的面向科学状态的经济学现代化转型。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范式参照，并基于计划经济建设实践形成了具有传统色彩和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④西方经济学则被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立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丰富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互动交融，中国经济思想再度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其核

① 前科学指成为科学之前的知识，库恩（2012）在其科学哲学观中将此阶段称为“前范式”阶段，即科学发展的早期的还未形成范式的阶段。在本文具体指中国古代虽包含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未能像西欧经济思想那样在18世纪末发展成为经济科学，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冲击下逐步尝试进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发展（缪德刚，2022）。

② “经济思想”从狭义角度看，主要是指前科学状态下尚未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的经济观念、观点，以及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和政策主张；从广义角度看，则除了狭义之外还包括科学状态下已经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的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经济学。随着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推进，其中的科学成分逐渐增多，相应地，“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经济学”的提法会逐渐取代“经济思想”的提法。参见巫宝三（1991）、钟祥财（2004）。本文采用广义的经济思想概念。

③ 《辞海》对“传统”的界定是“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继承性”。那么，何为现代呢？朱谦之（2015：84）认为，现代“是在知识生活为‘科学’，在社会生活为‘经济’的时代”，强调知识的科学性。

④ 李宜楠（1990）认为，“中国是一个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较深的国家”，清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各种错误观点”，必须从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入手。

心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吸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构建立足于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

尽管近代和当代^①有着历史时空背景的巨大差异，但正如同实现经济社会等领域现代化的旨趣始终不变一样，实现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的前科学状态向现代的科学状态的现代化转型，建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化经济学体系，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核心目标。与这一目标相适应，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动力是什么？变迁的条件是什么？变迁的模式是什么？变迁的结果是什么？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还缺乏一个相对贯通、系统、全面的回顾梳理。立足新的时代背景，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系统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变迁，回答中国经济思想在近当代历史大变局之下所变为何、途经何路、去往何处，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新时期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既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部分近当代通史性著作在导论部分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所做的简要探讨。此类研究大多或专论近代，或专论当代，鲜贯通近当代。不过，其间产生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关于近代，侯厚吉和吴其敬（1982：1—24）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1840—1919年）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部分，主线在于支持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反动经济思想与支持独立自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道路的进步经济思想的斗争，以及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该主线的变化即构成了阶段划分的依据。^②赵靖（1983）也主张相同的近代时段划分，提出了进步经济思想与反动经济思想对立斗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主线，并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分为“序幕阶段”（1840—

① 所谓“近代”和“当代”，主要指时间的概念。本文采取的是中国历史最为通用的“古”“近”“当（现）”的三分法，用以表述1840年前、1840—1949年以及1949年至今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949年以来，本文以“当代”称呼。

② 具体阶段划分为1840—1864年、1864—1905年和1905—1919年三个历史阶段。姚家华（1985：1—8）在近代时段和主线问题上呈类似理解，具体阶段划分则存在不同，分为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5—1900年和1901—1919年四个历史阶段。

1864年)和“主体阶段”(1864—1919年)。马伯煌(1988:1—33)进行了1840—1949年的近代全时段研究,他认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在于传统思想与当代经济思想的杂糅,以及固有封建主义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合,由此形成了四个时期和五股经济思潮。^①叶世昌(2017)同样着眼于近代全时段,且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五四运动为时间节点作历史分期,并在五四运动后,依据理论和主义的不同开展考察,但对此安排未作具体解释说明。^②邹进文(2016:6—8)则指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过渡背景下,经济思想相应地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二是引进西方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关于当代,既有研究多强调思想变迁的阶段性,并在一些主要时间节点特别是1978年、1992年上达成高度共识,主体部分多采取专题、学科、学术争鸣考察等研究体例。^③其中,白永秀和任保平(2009)指出,新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一脉相承,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主要思路就是围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展开,之后31年则是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

第二,对近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某一时段或变迁中的某些内容的考察。例如在重要时间节点上,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多为学界所重视。赵晓

① 四个时期和五股经济思潮为: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主要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主要为洋务思潮;1894年甲午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主要为资本主义思潮;1919年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要是新民主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

② 主要是分“代表两条道路的政治领袖的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进行考察。

③ 主要著作包括:张问敏著《中国当代经济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占才著《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柳欣、秦海英主编《新中国经济学6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张卓元等著《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程霖主编“复兴之路: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张卓元、张晓晶主编《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雷（2013）将中国经济思想于1919年发生重要转型的这一判断归纳为“胡寄窗分界”假说，认为以此为分界点，中国经济思想经历了从传统的、前科学的经济思想向现代的、科学的经济思想转型。该观点的基础是胡寄窗（1984：6—11）所作的分析，即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主线是“向西方学习”，其大致经历了从19世纪后半期传统经济思想与新引进的西方经济学斗争、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西方经济学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并迅速成长的演变。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唐任伍（1999），其以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为线索，探讨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又如在开展变迁考察的探索中，钟祥财（2006）突破以往通史性研究多采用的人物分析方法，以目标、学理、体制、产业、企业和收入分配等一些重要问题为主线，作为专著的研究框架，尝试考察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发展、转型的思维进程。赵晓雷（2019）则基于“发展与转型”的视角探讨了1949—2019年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以主要理论线索即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拓展、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探索等不同理论范式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演变，将中国经济思想主流形态的发展划分为构建、嬗变与转型。

第三，相对系统考察近当代中国经济思想中某一专题的思想变迁。此类研究日益增多，其特点在于，相较通史性成果在研究对象上更为具体，因此对变迁的考察也更为深入。例如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方面，王毅武（1991）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自1899年以来经历了六个历史阶段，^①并且以1949年为界，此前的主线是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此后则逐渐形成独立研究主题，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探索为主线。张问敏（1994）讨论了1899—1992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史，尤其侧重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又如在中国经济学方面，谈敏（2000）从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学主张出发，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学从提出到发展的轨迹。程霖、张申、陈旭东（2020）立足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界定，通过把握四条学理线索的交互变动，提炼出百年来中国经济学的提法和概念从分散到收敛、从分歧

① 六个阶段为1899—1921年的孕育时期、1921—1949年的产生时期、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1956—1966年的发展时期、1966—1976年的挫折时期和1976年以来的创新时期。

到共识的发展趋势。^① 易绵阳(2019)、张亚光和沈博(2021)专题探讨了近代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和逻辑。与此相关的,熊金武(2020)以近代民生经济学为案例,归纳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路径特征。豆建民(1997)则以过渡经济学为视角,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主要表现为选择与创新的双重变奏。此外,不少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②同样涉及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变迁轨迹与逻辑等的挖掘。

已有相关文献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多将近代、当代之间彼此割裂,二是对经济思想变迁的考察不够系统,三是对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观察视角单一。本文将集中开展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研究,从而较已有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创新之处:一是贯通性,覆盖中国近当代百余年的经济思想演变,并将1840年以来、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两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一同考察,深入揭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轨迹,既提炼其相似性,又对比其差异性;二是系统性,即通过构建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多个角度着手,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并为当下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现实镜鉴;三是全面性,不仅考察经济基础变动之于经济思想影响这一底层逻辑,也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等的学理影响,以及经济思想学科化、体系化发展的理论形态变化,对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做综合刻画。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阐释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变迁的目标,第二部分从内在驱动和外来冲击两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三部分论证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环境构成中国经济思想变迁

① 四条学理线索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

② 如顾海良、邹进文(2021)系统回顾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洪银兴、杨德才等(2021)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个时期党的经济思想做了系统回顾。

的条件，第四部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模式与路径，第五部分从主要成效和存在的不足两个层面总结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结果，最后是结语和展望。

一、变迁的目标：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总体目标是从传统的前科学状态向现代的科学状态转型，建立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化经济学体系。这一转型在近代和当代的不同时代背景下，在转型的起点、过程、方向和路径等方面表现出多重差异。立足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核心是前科学状态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亦即自先秦时期至鸦片战争前由中国本土内生形成的经济思想，因其与时代脱节而启动的现代化转型。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内容丰富，积淀深厚，形成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和值得珍视的思想创见，不少思想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并形成了一系列系统的经济政策，对古代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亦丰富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内涵，构成西方古典经济学如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先行思想要素之一，并对日本经营管理模式的建构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立法及宏观经济稳定都起到了借鉴作用（谈敏，1992；程霖、陈旭东、张申，2016；李超民，2002）。然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未取得突破，未能内生演化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独立的经济科学，始终处于前科学发展阶段。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亦表达过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整的经济政策体系和货币管理方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熊彼特，1991：86）。

对于上述局限性及其原因，近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例如，陈豹隐（2013/1931：137）认为中国古代有经济思想，但“大抵都是断片的思想，绝不足称为中国的经济学说”。朱通久（1941）同样指出，“我国在未与外国通商以前，既无‘经济学’之名称，亦无‘经济’之科学，经济史实及论说仅散见于各书，故在闭关时代，即谓我国并无经济学之存在，亦无可”。唐庆增（2010/1936：25）则认为，中国古代执政者“于本国经济学说之发展，无所裨助”，“但有消极的行动，而无积极的扶助”是导致经

济思想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西方国家“政府于经济学术，何等重视”，“认为确有价值者，则择要付诸实行”。时至当代，胡寄窗（1981b：472—473）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地理条件方面做了讨论，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如无剧烈的经济变革发生，古典经济思想便能长期延续而不会发生范式转型（赵晓雷，2013）。黄少安（2000）从中国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学的前提和主线视角切入指出，“中国长期在经济上（也在文化上）领先于世界，过去确实是地大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稀缺问题”，“因此，以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不发达”。赵凌云（1999）则梳理了“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疏于理性思维”“缺乏理论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的”“概念内涵模糊”等特性，来概括中国古代之所以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尽管学界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停滞原因的思考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嵌入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现代舶来经济学的持续传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作为一种“前科学时期的进步理论”（熊金武，2015），开始严重滞后于经济现实需要，愈发显得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且经过数十年的尝试性改造和顽固抵抗，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逐渐丧失其支配地位（谈敏，2008：1275）。正因如此，以现代化转型为目标的变迁势在必行，即，须从传统的与中国皇权专制统治下的自然经济和历史文化高度嵌联的、前科学形态的经济思想，向现代的与开放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独立的经济科学进行变迁。这一变迁使得中国经济思想逐渐步入科学发展阶段，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的学科建制，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研究在中国得到推广，并触发了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相关探索与实践。

立足当代看，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核心则具体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为参照、融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所建构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樊纲，1995；杨瑞龙，2019），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需要，进而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吸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构建立足于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中国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起点，经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中间过渡，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到

生动体现、取得显著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范式日趋成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知识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近代与当代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由于面临不同的历史起点、发展阶段和价值追求而呈现出一定的多向度特征，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以构建更具中国主体性、学理性、系统性的经济学体系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传统并不是保守、落后、消极的代名词，其中也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值得汲取的养分和可以传承创新的成分。如同虞和平（2004）所言，“对于传统与现代这两者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只从理论概念上进行评判，而应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变迁不是要完全割断传统、否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这才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变迁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近代曾有不少学者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化得多”，“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她是现在世界的趋势”（陈序经，1931）。20世纪90年代，也有不少经济学者曾对西方经济学持“全盘照搬”态度。但是，有更多中国学者充分认识到，简单地照搬移植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实践，更使得中国经济研究面临理论创新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林毅夫，2007）。

二、变迁的动力：内在驱动与外来冲击的叠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①经济思想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其受经

① 1859年1月，马克思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决定关系是绝对不能颠倒的，但其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参见黄光秋（2017）。

济基础、经济现实的影响较大。从历史视角看,经济思想的发展就是一个追求与不断变化着的经济现实相互匹配、适应的过程,一旦经济现实发生深刻变化,既有经济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内在地要求经济思想进行适应性变迁以形成更好的解释力、指导力和预测力(张申、程霖,2013)。以上逻辑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欧洲中世纪以后,随着自给自足的庄园制经济走向解体,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发展,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教统治的思想观念难以应对经济层面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经济思潮及其学说体系相继兴起,最终以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出版为标志,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经济学说批判继承、分析综合的基础之上,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得以确立,现代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基本思想也由此奠定。其间,既有英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有欧洲其他国家乃至中国的思想文化的传播影响。

将考察的视野放回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领主经济的瓦解和向地主经济的过渡,^①社会经济结构和性质发生历史性改变,由此经济思想随之经历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奠定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框架。此后,中国便进入一种“超稳定”(ultrastable)的结构(金观涛、刘青峰,2011),斯密(1974:87)也曾感叹“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社会经济结构和性质在长期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思想未能再次实现飞跃。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封闭的农业经济受到来自全球化商品经济的极大冲击,生产技术、经济结构、运行模式和意识观念等皆遭遇巨变,致使传统经济思想在短时间内无法弥补与现实经济发展间的巨大差距,直接促使本趋停滞、僵化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启动变迁,进入与现代经济学范式及世界经济思想对话的现代化路径。改革开放后,立足于从封闭计划经济向开放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主义现代

^① 这里援引胡寄窗(1998:2—4)研究所采用的理解,领主经济是以领主土地占有形式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地主经济是以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为基础的经济形式。领主经济是在西周时代占支配的经济形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型,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以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正式开始。

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经济思想再次启动变迁，也同此理。在以上不断追求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相匹配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变迁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具体呈现出两个维度的动力：一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驱动与需要，二是舶来经济思想引致的外部冲击与参照。

（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驱动与需要

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之间存在着正向互动关系，经济制度模式、技术模式、组织模式的现代化变革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并触发新的经济思潮、经济观念、经济政策，而这些经济思想的要素又会反过来引领经济制度、技术、组织实践的发展进步。以1840年和1978年为两大关键历史节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寻中上下求索，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两次大转型、大变革、大调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实集中涌现，很大程度上导致已有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在解释力、指导力和预测力上力有不逮，不能很好地满足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对新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强烈内在需求，从而构成了推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变迁的动力之一。并且，这一内在驱动力是最为根本的动力。

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次经济转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和资本输出，中国不仅遭受着强大的政治、军事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在逐步瓦解，“洋务运动”之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等多种现代化产业日渐涌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模式、技术应用模式、经济制度模式得到推广，启动并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且逐渐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随之逐渐形成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已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也在夹缝中不断成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以上社会经济结构与性质的重大变化随即对经济思想提出新的需求，即，曾取得光辉成就的传统经济思想逐渐变得相对陈旧和落后，无法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提供解释和指导，尤其是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等传统经济思想教条（赵靖、石世奇，1998：671），不仅在推动富民强国的目标实现上无法奏效，甚至还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构成了阻碍。

对此，一些来华传教士劝言，“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林乐知，

1976/1875: 1583), 因而应“不使拘泥古昔之道”(韦廉臣, 1998/1878: 215)。而且, 不少学者也萌生了转变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晚清学人中梁启超以求新著称, 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第一大问题就是缺乏创新活力, 并指出, “开新者兴, 守旧者灭, 开新者强, 守旧者弱, 天道然也, 人道然也”(梁启超, 2001: 133)。严复基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衰败, 对传统经济思想教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强调兼重义利观, 主张工商业和农业并重, 提出“母财(资本)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虚”(王栻, 1986: 880)。夏炎德(1948: 11)对这一思潮转变的论述也较为透彻, 其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一书中指出, 在外国势力侵入下, “中国停滞的经济即起剧烈的变化”, “国民经济呈江河日下之势”, 然而“古方也医治不了新病”, 所以“各种各样经济改造的思潮应时而起”, “中国经济思想展开了新页”。可见, 在近代被动对外开放开启第一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经济思想变迁的内在需求已然形成。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则是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之上。新中国成立后, 在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 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 中国以苏联模式为镜鉴, 开展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建立健全起到了重要积极作用。然而,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与旧方法、旧经验产生不适应,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述的教条化运用, 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实践中固有的问题, 使得彼时的经济思想再一次难以很好地满足现实需求。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认, 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 并逐步确立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极大地往前推进。

与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适应, 中国经济思想再次形成了自我突破的内在需求。如陈岱孙(1983)评价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术的发展“有过一段的经验和教训”: 一方面, 以苏联为蓝本的僵化学习未必符合中国实际, 特别是其若干经济理论也可能存在不正确性; 另一方面,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便与西方经济学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隔绝, 导致对西方经济学说最新发展动向几乎一无所知。因此,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 考虑到我国在国民经济规划以及企事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常年出现却又不能解决的问题, 以往的传统经济学术研究的思路、内容和范式等是时候需要实现

突破了。如其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驱动下，不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再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格局，促成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大转型、大繁荣、大发展。

（二）舶来经济思想引致的外部冲击与参照

正如谈敏（2008：1、2）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不可能独立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从古代传统社会的经济思想自行缓慢地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思想”，“打破中国数千年传统经济思想的体系框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由古典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型，是借助于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冲击和刺激而完成的”。鸦片战争后，与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冲击和刺激相伴随，包括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舶来经济学的传播所提供的外部冲击与参照，是推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另一动力。早在19世纪初，外国来华传教士就已开始在报刊上向中国传播自由贸易和通商有益思想，并通过译著介绍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李丹、刘明玉，2016）。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较早地向中国比较完整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著作并将其纳入中国教育体系。1867年他在京师同文馆开设了名为“富国策”的经济学课程，^①所用教材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后于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刊印。1886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专著 *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 以“富国养民策”为名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翻译出版（杨春学，2019）。据不完全统计，至1898年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译著已有12种26册（叶坦，1998）。1901—1902年，严复译《原富》的出版则拉开了斯密《国富论》在中国系统译介的序幕。此过程中，经济学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生计学”“经济学”等为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传播不断扩展、深化，逐渐成为西学中备受国人关注的一门科学（邹进文、张家源，2013）。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末以西方社会主义的记述为肇始，

^① 这里采用了叶坦（1998）的观点。戴金珊（1990）则认为，同文馆开设“富国策”课程是在1874年。

点滴却持续地传入中国，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世界已广泛采用的科学的分类体系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各个思想领域作了迅速而有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过此前的积累，也开始了其在中国的持续传播过程（谈敏，2008；赵晓雷，2013）。其间，中国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得益于他们留日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入学习。例如，李大钊在1914—191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喜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皮明麻，1991：306）。李汉俊、陈望道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和理论家，均在留日期间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有过交往，深受其影响（邹进文、邱小明，2016）。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从量变到质变，从启蒙到结出硕果，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上”（谈敏，2021）。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更是阔步向前，较西方经济学传播虽晚，但发展迅速，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甚至更为繁茂（胡寄窗，1984：432—433）。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冲破计划经济路径依赖的过程中，舶来经济学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方面，来自东欧部分国家和西欧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主要有：[罗] N. N. 康斯坦丁内斯库（N. N. Constantinescu）等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张志鹏、苏纪中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南] 米拉丁·科拉奇（Miladin Korać）、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Tihomir Vlaškalić）著《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理论分析原理》（邵玉环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波] 奥斯卡·兰格（Oskar R. Lange）著《政治经济学》（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罗] 格·普·阿波斯托尔（Gheorghe P. Apostol）主编《当代资本主义》（陆象淦、刘开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波] 布·明兹（Bronistaw Minc）著《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和发展趋势》（陈远志、李蕙华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下两册（宇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983年版）；[比]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著《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英] 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著《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仇启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

[英] 萨姆·阿罗诺维奇 (Sam Aaronovitch)、罗恩·史密斯 (Ron Smith) 等著《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波] 布·明兹著《现代政治经济学：原则、公理、论断》(许木兰等译校,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等等 (卫兴华、陈享光, 2001)。这些著作大多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 为打开国门后的中国学术界更好地认识世界,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提供了理论参照。

在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方面, 尽管启动为后, 但势头强劲。引入西方经济学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邀请西方经济学家访华交流。如 1985 年“巴山轮会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 邀请了耶鲁大学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剑桥大学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 (Alexander Cairncross)、匈牙利科学院亚诺什·科尔内 (János Kornai)、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等当时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和官员, 与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国官员和中青年经济学家交流讨论。二是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如 1980 年托宾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阿萨·林德贝克 (Assar Lindbeck) 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德·弗·格拉夫 (J. de V. Graaff) 的《理论福利经济学》、伊恩·李特尔 (Ian M. D. Little) 的《福利经济学评述》、威廉·谢佩德 (William G. Shepherd) 的《市场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等译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或第二次印刷。三是举办各类经济学讲习班。如 1979 年至 1982 年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的“国外经济学讲座”60 讲、1980 年劳伦斯·克莱因 (Lawrence R. Klein) 等 7 位美国经济学家讲授的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1981 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等 9 位美国经济学家讲授的发展经济学讲习班, 以及邹至庄后来陆续组织开展的人大福特班和复旦福特班等 (文世芳, 2017)。这些学术交流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方法等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传入中国学术界和政界, 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转型发展。

整体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舶来经济学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全方位的, 从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分析方法、制度设计、政策应用等方面提供了基本参照和激励, 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特别是在开放的早期阶段, 这种推动作用更大。但是, 从近代中国经

济思想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在传播还是应用方面均处于壁垒分明的分割状态，乃至逐渐形成对立。这一状态的转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与前一条线索相互融合（赵晓雷，2019：3）。并且，随着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两大学说体系的互动融合更频繁更深入，共融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历史逻辑也证明，中国现实才是接收外来冲击的落脚点，不同经济理论正是在与中国现实的对接中接受实践的检验、指导实践的发展，实现了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更为中国经济思想在批判吸收已有学说后的应用、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

三、变迁的条件：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环境

现代化是一个在世界范围集聚与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那么，现代性因素从何而来？长期以来，西欧的现代化被认为是内源性的，主要源于其自身传统中现代性因素的光大，而后其他大多国家的现代化则被视为外源性的，是对具有示范效应的西欧现代化的参照。事实上，现代化即便在西欧也不完全是内生的，而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汲取各国现代性因素，然后才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其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西欧在集聚现代性因素的过程中，曾受到世界的影响，特别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影响。研究显示，在1650—1750年欧洲曾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潮”，对中国的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有过全方位的吸收借鉴。^①所以，现代化的进程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环境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聚集与不断融合现代

^①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传教士撰写了中国游记在西方出版。如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所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1585年首版于罗马后，再版28次，被翻译成了9国文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所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1615年首版于德国后，再版12次，被翻译成了7国文字；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所著的《大中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在1642年以西班牙文出版后，再版12次，被翻译成了5国文字（尹保云，2006）。

性因素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国家、地区仅仅依靠自身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就能够单独进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内因和外因是交互作用而密不可分的。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发展亦同此理，尽管一国自身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是经济思想变迁的根源，但在开放环境下也会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

近代以降，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同样离不开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尽管这个开放初期是被动的乃至是屈辱的，却有力地击溃了时人从上到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夜郎自大心态，打破了晚清几近隔绝与外界交往的闭关锁国局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引入了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变迁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提供了参考借鉴。当然，相较于晚清被动的、浅表的、局部的开放，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选择主动、深入而渐趋全面的开放，是在发现中外经济发展巨大落差之后的自我觉醒。如同邓小平（1994：132）所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中国经济思想在彼时也面临这样一种境地。无疑，这两次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和国民得以突破长期封闭的视野，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来自世界其他文明的科技、文化、制度、创造等的冲击，汲取其中带有共通性或普适性的思想元素，这就为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

（一）从开放视角看中西经济思想“大分流”的原因

18世纪后，西欧尤其是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自此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曾经一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保持领先地位的中国则因循守旧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呈现伊懋可（Mark Elvin）所说的“量的增加，质的停滞”（Elvin, 1973：285—386）、抑或黄宗智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行龙，2000）的特征，走向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被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称为“大分流”，他从资源禀赋及其配置效率的视角对此给出了解释，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彭慕兰，2010）。尽管彭慕兰的相关学术观点受到不少质疑，却也触发许多新的研究和思考，为深入地思考和解读中西方的不同历史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与18世纪后中西经济发展走向的不同相伴的是，中西经济思想发展在现代化与科学化的层面上也出现了“大分流”，即中国长期固守适应于皇权专制统治和小农经

济的经济思想教条而趋于僵化和停滞，而西方则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的萌芽和发展，最终建立起独立且系统的现代经济科学学术体系。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西经济思想的“大分流”呢？笔者认为，除了经济转型发展不同路径的根本决定因素之外，中世纪之后、18世纪之前，中西方在开放问题上采取接纳还是排外、包容还是拒斥的不同选择，也成为导致18世纪中西方经济思想交流及其发展路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西方而言，在走出中世纪后，西欧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而地理大发现与各国工商业的成长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力量被引入支持工商业资本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与各国对外贸易扩展相伴随，欧洲对于知识传播和自由创造渐持宽容态度，并且在地理大发现以及阿拉伯世界科学知识传入之后，欧洲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文化和经济思想如饥似渴地加以吸收与接纳。传教士在该时期的中西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589年，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首次以“四书”概念将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利玛窦于1591年开始翻译《四书》并于1595年寄回罗马。这些儒家经典结合传教士中国游记的出版，使得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物质的富足有了更多认知了解，也让研究中国一度成为热潮，“中国学”（Sinology）也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其影响甚至逐渐超过中国经典本身，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铺垫。

18世纪50—70年代，法国重农学派作为重商主义的对立面出现，成为欧洲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其较早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演进的产物，但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作为该学派的奠基人，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黄台渊、金钟禄，2020：115），他对孔子非常推崇。他在向西方推介孔子时说，“中国人把孔子看作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代所留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魁奈，1992：37—38），并认为孔子的一部《论语》“充满了格言和道德原理，胜过希腊七贤之语”（利奇温，1962：94）。魁奈对此前法国重商主义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政策给予严厉批判，在讨论中国的“基本法”时，专辟“农业”一节介绍中国的农政事务，宣扬“农业为唯一富源”（利

奇温, 1962: 95)。日本学者泷本诚一 1931 年出版《欧洲经济史》，曾在附录中以“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为题论述相关问题（叶坦, 2003）。李肇义 1936 年在其留法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与古希腊和罗马不同的、高度发达且系统化的经济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令其他文明相形见绌的重大意义，并曾对法国重农学派产生重要影响（Ly, 1936: 7—8）。谈敏（1992）在其著作《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通过对中外资料的精心鉴别爬梳，全面论证了中国古代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所起到的启示作用。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 2004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 2009 年译成中文出版的著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也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霍布森, 2009: 176）。

斯密对经济学从古典转入现代、从前科学转入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恩格斯称为“经济学的路德”（恩格斯, 2009: 61）。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文化交流环境，斯密的经济学说形成也是不可想象的。1765 年秋，斯密曾赴瑞士日内瓦多次拜访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随后又访问法国巴黎，与魁奈、安纳·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等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的一些经济观点进行交流，重农学派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影响了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完成（唐任伍, 1996: 43），而《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历史上繁荣与长期停滞的原因也多有论述。魁奈文集《重农主义》出版之后，斯密也曾获得赠书。这些高度认可中国文明及其传统思想的思想家，对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究竟几何，也许难以精确度量，但这个影响无疑是确定存在的。尤其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与法国重农学派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主义之间，存在着颇多共通之处，而后者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Young（1996）甚至推断斯密有可能直接从杜尔哥及与之熟识的两位留法中国学者高类思（Lei-szu Kao）、杨德望（Te-wang Yang）那里了解到司马迁的思想。日本经济学家穗积文雄（Hozumi, 1940）也曾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体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加以分析，认为司马迁的经济观、经济理论乃至经济政策均与斯密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与西方不同,同时期的中国曾一度对于西方持排斥态度,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顺治三年(1646)编制的《大清律》中就有关于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闽浙总督屯泰请于沿海省份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①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将对外通商口岸限缩在广州,并且对外商在广州的活动也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和苛繁要求。从人类文明史看,商业互动、贸易往来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助推剂,相反,文明交往中的贸易不畅则往往会带来战争。清政府这种封闭半封闭的体制一直沿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列强以枪炮撬开中国国门后使得中国被动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与对外贸易走向封闭相伴随的是,自明朝一度由西方来华传教士所开拓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进入清朝之后日趋衰落。特别是随着罗马教廷发出禁止天主教中国教徒祭祖尊孔指令后,雍正推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并沿袭至道光年间,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逐渐从过去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转向满足皇帝个人追求西洋奇物的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依然沉浸于传统的中华世界体系,认为“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张斯桂,1985:153),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对西方制度、思想等文化内核嗤之以鼻,关闭通商口岸、限缩中外贸易,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唐庆增(2010/1936:24)曾感慨,西方经济思想“在十三四世纪时,已略有规模,如能输入中国,则中国经济思想必能收观摩之益”。然而,贸易和文化上的对外封闭,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思想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也失去了参考借鉴和相互竞争可带来的促进作用,为此后中国的故步自封、落后挨打埋下了伏笔,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经济思想在发展路径上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差异。

(二) 从封闭走向开放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变迁创造了条件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唯有身处一个开放的环境,才能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广

^①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兵部·绿营处分例·海禁一》。

泛汲取现代性因素、推动现代化建设成为可能。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思想变迁而言，无论是自中国古代沿袭而来的传统经济思想，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效仿苏联采用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均是在一个开放性相对不足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难以满足被动或主动开放的新环境下社会经济急剧变革所提出的经济思想需要。尤其是中国古代时期，经济思想“一直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习惯于一种封闭条件下的思维模式”（谈敏，1999：6—7），没有外力因素的冲击和推动，以及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改革实践的探索，难以内生地实现大的创新突破。马克思（1961：111）曾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被动开放和与西方的接触，推动中国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渐卷入世界市场，从而促使中国经济思想在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上有所内省，在与舶来经济思想的较量失利中有所警醒，而奋起直追开启了现代化转型。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后知后觉地认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志刚，2008：384）。于是受情势所迫，自此时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高层官员集体出洋考察，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进行了解，并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这些公使浸润于西方政教制度，也开始对西方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有所接触了解。例如，中国历史上首位正式派驻外国的使臣郭嵩焘，在驻英公使任内就注意到西方偏重富民而中国偏重富国的差别，并对西方经济理论，如斯密《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产生浓厚兴趣，提出“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郭嵩焘，2008：561）等看法。与政府官员主动走出国门引入西学信息相伴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海外留学生群体也相继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布道者”的作用，渐次将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从零星到系统地引入中国。因此，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进而融入世界，无疑是近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开放，从促动经济转型发展和提供经济思想外部参照两个层面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变迁创造了条件。

近当代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则是1978年以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相对主动地融入世界，较第一次开放要更为全面、深入和持续。此次开放同样有20世纪70年代末一系列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出国考察作为铺垫，访问对象包括西欧

五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日本、东南亚等国，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其中，以谷牧副总理带队对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西欧五国的出访影响最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其考察成果被凝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中。除了积极“走出去”外，国门开放之后中国政府还积极邀请外国专家来中国担任经济顾问。例如，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创造者的大来佐武郎1979年初就曾受邀来华与中国经济官员和专家座谈（魏众，2019）。时任副总理谷牧（2014：332）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一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

对外开放之于1978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一则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现实参照，推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世界，正视自身的落后处境，从而建立赶超的目标，并通过引进和学习来掌握相关知识和信息；再则也触发、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制度变革，引发了国内关于如何以改革开放打破自身内部不合理的旧体制机制藩篱，更好地融入世界、发展自身的相关思考与实践。对中国经济思想转型发展而言，此二点也大致适用。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扭转了过去那种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同时，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等元素也均被纳入基本的学科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之中，并且越来越注重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建构与升华，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严谨性和规范性也逐步提升。正是这一对外开放的历史性举措，使得此后的中国经济思想逐步结束了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状态（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2018），现代化转型较近代时期更进一步。

四、变迁的模式与路径：引进、学习、选择与创新

前述可见，在变迁的动力与条件作用下，中国经济思想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基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驱动和舶来经济学的外部冲击而生成一系列反

馈，从而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转型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模式与路径。此前，笔者曾就中国工业化思想的产生进行过专题考察，发现其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具有直接关联，但通过借用人类社会学中的“涵化”^①概念而进一步研究发现，该传播的结果并非简单的“排拒”或“替代”，而是经过“综合”与“创新”，才得以形成工业化思想这一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中都没有（至少是尚未充分发展）的体系（张申、程霖，2013）。从更广的层面来考察近代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化问题，可以发现“中国化”的过程在大体上也呈现出“引进”“学习”“选择”“创新”的层层递进的变迁模式（程霖、张申、陈旭东，2018）。^②具体而言，舶来经济学的引进，对已不适用的传统经济思想形成了冲击，替代了束缚社会发展的僵化思想教条。由此，国人对在彼时看来更为先进的经济学说开展了广泛学习，并根据本土需要，对已有内容做出了选择、变通乃至发展，构成了初步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国人逐步意识到，已有经济学说无法充分解决中国问题，故而尝试启动理论创新和更大程度的系统突破，并最终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以上便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两大模式和路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学习与选择，二是自主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也遵循此理。同时可以发现，以上模式之间具有递进的逻辑关联，引进、学习与选择是基础和过程，创新则是目标和主线。

（一）引进、学习与选择：西学东渐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之于舶来经济学的引进、学习和选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晚清时期（1840—1911年）。19世纪末以前，外国来华传教士在晚清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传播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方经济学以及马

① 所谓“涵化”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在持续接触时，一方或多方群体的原有文化随之发生变化的现象。

② 当然，这一模式非完全为中国独有，其他后发国家在经济赶超和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遵循此规律。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李浩、梁永康，2008）。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早期阶段，译著书刊、开设课程是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主要方式。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则经历了在舶来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之间的选择，其间曾有“中体西用”、器物乃至制度层面的仿照，以及在传播舶来经济学时也不时采用传统观点等的做法，既推动了长期以来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启动转型，又从客观上不断论证了传统经济思想在科学性与适用性上的缺陷，使得后者在20世纪初让位于舶来经济学。当然，严复、梁启超、陈焕章等也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换，论证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存在共通之处。^①

二是民国时期（1911—1949年）。1911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的转折，对舶来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关于民国时期对于舶来经济学的引进和学习，整体来看，西方经济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历了从发展到高潮的传播表现（Cheng and Zhang, 2017），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性发展节点，这在前文已均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进和学习的过程也始终伴随着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选择。首先，是对舶来经济学中诸种内容的选择。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更为明显，例如对于斯密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学说与李斯特的国家干预、保护贸易学说的政策争论，对于中国究竟应实行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学术争鸣，法币改革后对于中国货币本位的制度分歧等，这些争论使得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不同学说的异同与优劣认识得更为深入、全面（程霖、张申、陈旭东，2018）。其次，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间的选择。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形成独立的传播格局，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斗争也随之变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斗争。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此逐步上升为指导思想。此选择一面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对立，一面又在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问题上相容探求，共同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转型提供了滋养（谈敏，2021）。

^① 在严复《原富》“译事例言”、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陈焕章《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中，均可见相关论述。

三是建设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我国以苏联为学习对象，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导致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发生变化。在此阶段，中国经济思想继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选择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苏联的经济建设实践为主要范式参照，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此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古典经济学因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得到了一定提及，国内学界对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以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大量涌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全无所知（胡寄窗，1988：1），即使有也主要是以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称而对其基本持否定态度，致使中国经济思想引进与学习的来源受限，与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前沿日益脱节。当然，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界也曾有过短暂的学术活跃，主要体现为在当时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参照的框架下，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若干理论问题形成了大量学术争鸣和认知深化，例如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等（《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1981）。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四是改革时期（1978年至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为重要标志，中国经济理论界又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逐步导入正轨，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应用也得到重启。前文对此已有较多论述。该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如何学习、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面，显示出更为强烈的理论自觉，形成了不同层面的诸种观点，客观上完善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例如，陈岱孙（1995）认为，不能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产生盲目崇拜，应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发展中国家及苏联东欧经济研究与国内经济问题相结合。崔之元（1995）认为，西方经济学已暴露出若干范式危机，有待中国经济学者共同做出基础理论的创新。王诚、李鑫（2014）认为，“只要继承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使分析工具是西方经济学的”，这样的经济理论也是社会主义的。程恩富、何干强（2009）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上现象均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根基，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思

想在转型过程中的成长。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自主性、中国经济理论建构的自觉性日益增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人的一项学术使命自觉,形成了诸多讨论(张卓元,2022;杨瑞龙,2022;刘守英,2022;盛斌,2022;刘元春,2022;刘瑞,202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习近平,2020,2021)。以上重要思想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也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提供了新空间。由此可见,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到现代变迁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研究初衷和研究目标上应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从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上应实现突破创新,因此应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但在理论和思想来源上,不应将西方经济学排除在外,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借鉴。

(二) 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构建的三次高潮

如前所言,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的学习和引进,更是面向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发展和 innovation,而该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其理论诉求与实践探索贯穿了近百年历史,经历了三次高潮(程霖、张申、陈旭东,2020)。

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近代中国在经济学的对外交流上处于“逆差”状态,许多有志之士提出了“进口替代”的主张,并汇集成了第一次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的高潮。李权时(1930)出版《经济学原理》,其一大动机即在于以“制造国货”“替代来路货”。赵人俊(2010/1936:5)在为唐庆增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所作序中,期许后者“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①王亚南(1941)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经

^① 以甘乃光、熊梦、李权时、唐庆增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学说、理论的发掘、整理和提炼”(叶坦,1998),为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奠定了基石,也奠定了经济科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及自主性建构的学理基础。

济学’这个语辞的提出”，“是希望中国经济学界，不再是一味‘消纳’所谓英美学派，德奥学派，乃至苏联学派的经济学说的‘市场’，而能自己加工制作一个适于国人消费且满足国家需求的国产货色”。1944年，他还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阐述了中国经济学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王亚南，1944），并创作《中国经济原论》躬身实践。江公正（1947：1）在其著作《民生经济学》中也呼吁，“以中国固有的优良文化为根基，兼取西洋文化之所长……创立适合国情有益全民族的新经济学”。此外，结合当时中国不同领域的经济实践，近代中国经济学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推出了以“中国”二字冠首的系列经济学著述，探索金融学、财政学、农业经济学等分支领域的体系再造。

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转型不断深入、发展不断突破，经济改革与经济体制的创新，现实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呼唤经济理论的革新与指导。同时，随着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厘清计划与市场的意识形态之争，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变得更为顺畅。在此实践和理论背景之下，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成为当时国内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术界形成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争论，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问题的讨论：刘诗白（1997）立足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围绕“要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怎样建立中国经济学”，提出中国“需要构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具有强实践功能的中国经济学”；叶坦（1998）在考辨汉语“经济”一词的切实含义、变迁轨迹基础上，也对中国接受“西学”并着力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历程进行了考证；还有诸多经济学家纷纷参与到讨论之中，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历史背景、理论来源、指导思想与原则、主要目标、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发展趋势等问题。

第三次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并崛起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命题，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总结梳理纷呈迭出，一度也形成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

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2020）。以上重要论述得到了学界的热切响应，这一方面表现为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认识更为明确、共识更为凸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基本框架下形成更多深入且具体的观点。

例如，洪银兴（2016）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学科定位界定为“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刘伟（2016）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分析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在现阶段应着重阐释如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周文（2016）指出，“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完成中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再到话语优势的三个层次递进和转换”，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顾海良（2016）提出，应将“术语的革命”作为重要标识，以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高培勇（2017）认为，“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灵魂”，应从我国经济改革和实践中挖掘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杨瑞龙（2018）总结了立足于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模式的一系列主要特征，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于别国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原因，主张从理论上提炼中国经济改革经验；张军（2020）强调应在经济发展的逻辑框架里识别清楚中国的初始条件和特有的约束条件，以此作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白永秀、刘盼（2021）认为中国经济学应以特定时空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为研究对象，建立“微观—中观—宏观—全球观”的研究范式；林毅夫（2021）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胡乐明（2021）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因其发展了分析方法，拓展了理论内容，丰富了政策体系，弘扬了时代价值；刘伟、陈彦斌（2022）指出，中国经济学的实现途径在于“以教材体系为突破，以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洪永森（2022）强调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的内涵，即应从中国经济特殊性中挖掘一般性，以对当今世界经济学做出原创性贡献；张晓晶（2022）对中国当代发展经验，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宏观调控等进行了理论概括，指出中国经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内核。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充实了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内涵。

五、变迁的结果：主要成效和存在的不足

以爆发鸦片战争的1840年和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关键时点，中国经济思想在两次开放大潮中分别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变迁。由于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背景不同、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现实问题不同、国外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发展的程度不同、国内经济学术人力资本的储备也不同，使得中国经济思想的两次转型变迁从形式到内容均有所差异，但其基本方向是有一致性的，均指向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目标，并在各自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具体而言，主要的成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思想实现从传统的、前科学状态向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转型，并被纳入经济学的学科建制中，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话语逐渐生成并不断发展，构建起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一大突出成就，就是在近代即转变了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的三大基本教条，使得肯定财利、重视工商等更加进步的经济观念逐渐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主流观念。在此基础上，引进了诸如“工业”“企业”“经济”“会计”“资本”“预算”“决算”“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口”“市场”“交换”“分配”“金融”“财政”等一系列经济专业术语（实藤惠秀，1983：327—335）。另外，还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吸收了数量分析法、演绎法、归纳法、历史法、辩证法，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等（王昉，2009；信瑶瑶、张申，2021）。以上努力共同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经济学科是从19世纪中后期的外国传教士的教育启蒙中开启的，随后留日学生、留欧留美学生渐次归国，推动了经济学传播的学科化和专业化。1926年，何廉曾访问国内一些院校并了解经济学教学工作，包括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

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加上其所在的南开大学，20世纪20年代至少有13所高校有专门的经济学教育（何廉，1988：5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思想在曲折中发展，其一方面深入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所提出的经济知识和人才需求，^①也借鉴苏联教育模式对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强化了专业概念，设置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财政、贸易、计划、统计等以往没有的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时从西方引进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对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论上产生了有关实证研究、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等的影响。经济学专业也得到恢复和扩展，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几乎所有综合类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都设置了财经类院系和专业（赵晓雷，2019：249—252、254—258、434—444），并形成了以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为一级学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②其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研究基础的不断夯实，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部署下，对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探索也日渐起步。比较有标志性

① 1950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1950）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提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②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其中，统计学由原来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授予经济学和理学学位。这样，理论经济学继续保持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6个二级学科；而应用经济学则包括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含：税收学）、金融学（含：保险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等9个二级学科。基于2011年颁布、2018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2年又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经济学学科大类下，除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之外，还设置了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数字经济等仅可授硕士学位的专业学位类别。

的探索实践，如2021年教育部公布并启动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财政学》《中国区域经济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等9部中国经济学首批教材的编写工作，为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提供了可能。

二是中国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实践的互动不断加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事关改革大方向的基本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具体问题的解决相适应，理论界和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聚焦具体实践领域的研究创新成果。经济思想、经济理论是经济实践的产物，并通过经济实践的检验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两次大变革、大转型实践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沃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大量经济理论创新成果。改革开放前形成了农、轻、重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等。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更是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对如何正确处理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等基本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了得到实践检验的有益探索（程霖、陈旭东，2018）。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此同时，围绕中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中国经济学人形成了一大批经济理论创新成果。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理论界有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等。改革开放后，理论界的创新更为活跃。例如，以杜润生为主要贡献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厉以宁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以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以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为主要贡献人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以黄达为主要贡献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以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为主要贡献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以李实、赵人伟、陈宗胜为主要贡献人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

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以卫兴华、洪银兴、魏杰为主要贡献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以杨瑞龙研究组（杨瑞龙、周业安）为主要贡献人的“国企分类改革与共同治理研究”等，这些理论均是扎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现实土壤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①

三是中国经济思想在开放砥砺与实践磨砺的基础上，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断形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构建在历经百年探索后逐步聚焦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上来。构建中国经济学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人的一种使命与学术自觉：其在近代更多是体现为外辱内乱中的救亡图存，希望通过睁眼看世界而反躬自省、奋发图强，寻求能够拯救国家于水火、实现国富民强的经济良方；而在当代则更多是表现为经济崛起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试图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经济规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总结，并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经历了一个反思、批判、继承、创新的过程，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从而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两次转型变迁破除了思想藩篱和观念束缚，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探索也做出了越来越细致深入的探讨。

百年探索过程中，中国经济学人围绕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取得了颇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深化的一系列成果。例如在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问题上，早在近代，学者即通过“经济科学中国化”“独立发展我国经济学”“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科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等提法，明确了中国经济学应以中国人为立场、研究中国经济、能够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并指明未来方向而形成独立创新的理论体系等的概念要素，搭建起了包括中国经济历史演进、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经济运行、中国生产关系等的近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形成了诸如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江公正《民生经济学》、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代表性研究成果。另外，还在一些具体领域，如土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

^① 上述经济理论参见由董辅初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国内主要经济管理院系合作主办，自2008年开始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届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等开展了专题探索。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学界进一步明确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并吸收古今中外多种经济学说，提出应发展独特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并强调应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使得中国经济学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形态和研究特征等的概念要素不断清晰。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界在体系框架、逻辑主线、主要问题、重大原则、创新路径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具体设想与尝试性讨论，并形成了诸多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探讨，经济学分支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也在同步推进，共同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但客观而言，当前我国的经济学发展水平与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战略需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许多经济研究的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仍较为缺乏，严谨规范的原创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存在照搬国外理论现象，忽视了任何理论都以特定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系统挖掘还不够，在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有机结合方面有欠缺，在不少期刊的论文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学滥用”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学思想的创新（陆蓉、邓鸣茂，2017）。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思想依然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现代化转型变迁中途，中国经济学需要进一步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说明”（谢伏瞻，2022），才能真正建构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建立起更具学理化和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还需要对具有前沿性、一般性的经济科学前沿问题作出原创性贡献，才能使得中国经济理论在世界经济学术舞台上、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回顾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具有较强国别色彩的经济学的建立，往往需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学术研究的必要性、特殊性和稳定性，二是涌现了一系列具体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三是必要的综合概括和系统提炼。尽管目前中国已基本具备了以上三个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充分，并不代表构建中国经济学是顺其自然、瓜熟蒂落的，而是需要政府有意识的引导支持和国内经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努力，以及政学商的互动（程霖、谢瑶，2023），否则就难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系统化

的经济学说。正如20世纪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也是建立在主要国家政府引导确立经济研究问题、改革经济研究机构、加大扶持力度等一系列“有所为”的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仍处于探索实践当中，有许多新的理论素材值得挖掘整理，这将极大地丰富建构之中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结语与展望

近代以来，与中国经济经历了两次以市场化、现代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经历了两次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转型变迁，基本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势，即在通过引进、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要素与分析范式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进行自主创新，不断开拓中国经济思想的理论境界，建设和发展立足本国、适应本土的经济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这两次变迁既包含从传统的、前科学的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的范式的转型，也包含从“向西方取经”的知识移植进路向“念好自己的经”的知识创新进路的转型，其变迁的动力来自近当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对经济思想变革的客观需求，其变迁的条件是在经济和思想上与世界进行开放性接触，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提供外来经济思想借鉴。这一现代化变迁使得中国经济思想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实践在曲折中前行。

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变迁同样未达终点。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蓝图的实现需要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需要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与之相适应，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黄群慧，2022），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新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变迁的重要目标任务。对照这一目标任务，未来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在以下

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发挥学科的龙头作用和教材的引导作用，完善学科布局，加强教材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现有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学科分设格局是一大中国特色，但不应固化为学科壁垒，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这既需要经济学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也需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叉融合，更需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大跨度的交叉融合（刘伟、陈彦斌，2022）。同时，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关键抓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学教材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关键问题为导向，着力从经济学层面推动中国实践理论化、中国经验一般化，系统梳理中国经济理论的独创性贡献和一般性价值，讲好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故事，并用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理论和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有学者认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会带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转移。^①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若干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中国经济学人应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和学术化阐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开放的胸怀和视野，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充分汲取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努力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

① 如同林毅夫（2007）所言，当一个大国的经济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的时候，关于这个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将为世界所瞩目，其成果也将有可能成为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

三是要聚焦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凝练新概念,加快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2016)确实,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转型发展,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典型事实的大量素材和经验事实,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难以有效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董志勇,2021),这为中国经济学人进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再造,提供了丰富土壤。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孕育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等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影响和价值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通过对其中所蕴含的诸多新概念、范畴的系统化、理论化梳理,厘清与西方经济学一般概念、范畴的区别和联系,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将有助于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经济发展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1981,《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白永秀、刘盼,2021,《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改革》第2期。
- 白永秀、任保平主编,2009,《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陈豹隐,2013,《经济学原理十讲》(上),载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编《陈豹隐全集》第1卷(2),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陈岱孙,198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岱孙,1995,《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经济学动态》第11期。
- 陈序经,1931,《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第3期。
- 程恩富、何干强,2009,《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 程霖、陈旭东,2018,《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程霖、陈旭东、张申，2016，《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 程霖、谢瑶，2023，《中国经济学构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社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程霖、张申、陈旭东，2018，《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第7期。
- 程霖、张申、陈旭东，2020，《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第9期。
- 崔之元，1995，《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中国书评》9月号。
- 戴金珊，1990，《亚当·斯密与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 董志勇，202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壮举》，载《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创造与实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笔谈》，《经济科学》第4期。
- 豆建民，1997，《选择与创新——从过渡经济看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财经研究》第2期。
- 恩格斯，弗，2009，《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 樊纲，1995，《“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第10期。
- 高培勇，2017，《经济所、经济所人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经济研究》第5期。
- 谷牧，2014，《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 顾海良，2016，《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 顾海良、邹进文总主编，2021，《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第1—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 郭嵩焘，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 何廉，1988，《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 洪银兴，2016，《以创新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济研究》第4期。
- 洪银兴、杨德才等，202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
- 洪永森，2022，《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管理世界》第6期。
- 侯厚吉、吴其敬主编，198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胡寄窗，1981a，《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经济问题探索》第4、5期。
- 胡寄窗，1981b，《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寄窗，1984，《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绪论》，载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寄窗, 1988, 《一八七〇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序言》, 载胡寄窗《一八七〇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 经济科学出版社。
- 胡寄窗, 1998,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胡乐明, 2021,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 黄光秋, 2017,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比较——“同一”关系: “决定”内涵, “同创互补”过程》,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黄群慧, 2022,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18日。
- 黄少安, 2000,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 《经济研究》第5期。
- 黄台渊、金钟禄, 2020, 《孔夫子与欧洲思想启蒙》, 卢珍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 霍布森, 约翰, 2009,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孙建党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 江公正, 1947, 《民生经济学》, 自由论坛杂志社。
- 金观涛、刘青峰, 2011, 《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法律出版社。
- 库恩, 托马斯, 2012, 《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魁奈, 弗朗斯瓦, 1992,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谈敏译, 商务印书馆。
- 李超民, 2002, 《常平仓: 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 上海远东出版社。
- 李丹、刘明玉, 2016, 《晚清西方经济学说在华的早期传播——以外国来华传教士著述活动为中心》,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李浩、梁永康, 2008, 《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
- 李权时, 1930, 《经济学原理·三版自序》, 载李权时《经济学原理》, 东南书局。
- 李宜楠, 1990,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述评导言》, 《改革与战略》第3期。
- 利奇温, 1962,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馆。
- 梁启超, 2001, 《〈经世文新编〉序》, 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 吴松等点校, 云南教育出版社。
- 林乐知, 1976, 《中西关系略论》, 载《万国公报》(3), 华文书局。
- 林毅夫, 2007, 《中国经济学的机遇和挑战》, 《当代经济》第7期。
- 林毅夫, 2021,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大学与学科》第3期。
- 林重庆、苏国利、吴素萍, 2018, 《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
- 刘瑞, 2022,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学术探索》第9期。
- 刘诗白, 1997, 《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 《经济学家》第1期。
- 刘守英, 2022,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一般性》,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第6期。

- 刘伟, 2016,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研究》第5期。
- 刘伟、陈彦斌, 2022, 《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生态体系——以教材体系为突破 以知识体系为基础 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管理世界》第6期。
- 刘元春, 2022, 《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关键》, 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 《管理世界》第6期。
- 陆蓉、邓鸣茂, 2017, 《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 《管理世界》第11期。
- 马伯煌主编, 1988,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马克思, 卡, 1961,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叙伦, 1950, 《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 《人民教育》第3期。
- 缪德刚, 2022,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学科化建构》, 《经济思想史学刊》第1期。
- 彭慕兰, 2010,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皮明麻, 1991,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 吉林文史出版社。
- 盛斌, 2022, 《构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发展自信到理论自信》, 《世界经济研究》第12期。
- 实藤惠秀, 1983,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林启彦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斯密, 亚当, 1974,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 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 谈敏, 1992,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谈敏, 1999, 《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总序》, 载赵晓雷《新中国经济理论史》,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谈敏, 2000, 《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 《经济研究》第4期。
- 谈敏, 2008, 《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下),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谈敏, 2021,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示》, 《经济思想史学刊》第1期。
- 唐庆增, 2010, 《中国经济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 唐任伍, 1996, 《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唐任伍, 1999, 《“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王诚、李鑫, 2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市场取向改革以来学术

界相关理论探索》，《经济研究》第6期。

王昉，2009，《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王栻主编，1986，《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

王亚南，1941，《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新建设》第10期。

王亚南，1944，《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东南日报》11月14、15、18日。

王毅武，199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韦廉臣，1998，《著书弁言》，载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卫兴华、陈享光，2001，《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济评论》第2期。

魏众，2019，《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

文世芳，2017，《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

巫宝三，1991，《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

习近平，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习近平，2021，《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求是》第23期。

夏炎德，1948，《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

谢伏瞻，2022，《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经济学人的使命——〈中国经济学手册·导言〉》，《经济研究》第1期。

信瑶瑶、张中，2021，《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行龙，2000，《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历史研究》第4期。

熊彼特，约瑟夫，1991，《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熊金武，2015，《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

熊金武，2020，《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1840—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春学，2019，《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杨瑞龙, 2018, 《四十年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 杨瑞龙, 2019,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 杨瑞龙, 2022,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人民日报》8月15日。
- 姚家华, 1985,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简史》,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叶世昌, 2017,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下),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叶坦, 1998, 《“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叶坦, 2003, 《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 易绵阳, 2019,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财经研究》第7期。
- 尹保云, 2006, 《现代化进程的性质及历史视野——对“内因-外因”分析模式的反思》,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虞和平, 2004, 《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 《史学月刊》第6期。
- 张军, 2020, 《原创性理论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载《构建中国经济学笔谈》,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张中、程霖, 2013, 《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外在动力和内在演化——基于涵化视角的考察》, 《财经研究》第12期。
- 张斯桂, 1985, 《使东诗录》, 费成康校注, 岳麓书社。
- 张问敏, 1994, 《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张晓晶, 2022, 《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亚光、沈博, 2021, 《格义、分野、自立: 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 《财经研究》第1期。
- 张卓元, 2022,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评〈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动态》第4期。
- 赵靖, 1983,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 人民出版社。
- 赵靖、石世奇编, 1998,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凌云, 1999, 《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 《寻根》第1期。
- 赵人俊, 2010, 《中国经济思想史·赵序》, 载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 赵晓雷, 2013,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 “胡寄窗分界”假说论证》, 《财经研究》第10期。
- 赵晓雷,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 经济思想发展与转型(1949—201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志刚, 2008, 《初使泰西记》, 岳麓书社。

钟祥财, 2004, 《经济思想的涵义及其史的写法》, 《上海经济研究》第10期。

钟祥财, 2006, 《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 东方出版中心。

周文, 2016, 《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 《经济研究》第3期。

朱谦之, 2015, 《什么是现代》, 载黄夏年编《朱谦之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朱通久, 1941, 《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 《财政评论》第3期。

邹进文、邱小明, 2016,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播: 立足于留学生的考察》, 《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

邹进文、张家源, 2013, 《Economy、Economics 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4期。

邹进文主编, 2016, 《新编经济思想史》第6卷《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

Cheng, Lin, and Shen Zhang. 2017. "The Spread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eatures and Influence (1840 - 1949)."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12 (2): 193 - 227.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zumi, Fumio. 1940. "Ssu-ma Chien's Economic Outlook." *The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5 (1): 16 - 29.

Ly, Siou-y. 1936.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Chinoise dans L'Antiquité et leur Influenc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Physiocratique*. Paris: Jouve & C^{ie} Éditeurs.

Young, Leslie. 1996. "The Tao of Markets: 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 (2): 137 - 145.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since Modern Times

Cheng Lin^a, Chen Xudong^b and Zhang Shen^c

(School of Economics/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since 1840. The goal is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economic theory serv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riving force is the internal demand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foreign idea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i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re the two opening-up in 1840 and 1978.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learning, selecting and innovating,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mature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keeps a foothol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theoriz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s of reform and develop, and realizes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prescientific state to the modern, scientific state. Also,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conomy is still in progres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has not reached the e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ing a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are important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a's Economic Thought,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Chinese Economics

JEL Classification: B10, B20, N01

(责任编辑：王姣娜)